



帝国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史集译

Godwin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出版者說明

考茨基的《帝国主义》一文写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大战爆发后，发表在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新时代》杂志上。这个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理論刊物（周刊），由考茨基主編。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自己給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分析了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鼓吹帝国主义发展成“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文章包含了考茨基此后进一步发挥的“超帝国主义”論的一切主要論点。这是考茨基公开背叛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曾多次对考茨基这种謬論加以駁斥，认为“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論，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論”（《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99頁）。

考茨基的所謂帝国主义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資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資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論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資本的統治，而在于財政資本的統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

考茨基在提出帝国主义的定义时，还表示反对把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現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統治和殖民政策都概括

到帝国主义名下，反对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就是說，考茨基否认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是金融資本和垄断制，否认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特殊的阶段，即垄断阶段。

考茨基认为，資本主义工业国在进行扩展时，可能采用种种的形式。比如，当英国保持作为世界工場的独占地位时，采用的是自由貿易的形式。随着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开始用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的自由貿易，要求共同来瓜分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引起了英国的反击，这样，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就为帝国主义政策所代替了。与此同时，資本主义工业国为了扩大市場和原料来源，在农业地区进行資本輸出，其結果，刺激了农业国本身的工业发展，引起了竞争。为了保证輸出的資本有利可图，資本主义工业国力图使农业国只从事农业生产，形成“資本主义工业国把农业地区”“当成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考茨基认为，这就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最重要根源。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定义和帝国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割裂了帝国主义政治和經濟的联系，迴避了帝国主义同金融資本和垄断制的必然联系，其目的在为把帝国主义說成只是“資本主义进行扩展时可以采取的形式之一”，或者說是“一种特殊形式”、“一种政策”。考茨基說：“自由貿易在半个世紀以前，正像帝国主义在今天一样，被看成資本主义的頂峰”，“因此，既然自由貿易能为帝国主义所代替，帝国主义当然也能够为另一种政策所代替。”考茨基虽然也說，“我們当然必須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但是既然反对的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这种政策的經濟基础，那只不过是資產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实际上等于更巧妙、更隱蔽也就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妥协。

考茨基虽然无法否认，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军备竞赛、世界大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本国无产阶级反抗的增长等等，“威胁着帝国主义的全体”；但是，他却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只要帝国主义改变目前的政策，不是通过强力而是通过和平的方法，资本主义还不一定会走向穷途末路，因为“任何资本主义大国在同其他类似国家的对抗中扩大自己的殖民地国家的要求，仅仅是促进资本主义扩张的许多手段之一”，而“改变这种意图是完全可能的。”“可见，从纯经济的立场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

考茨基进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可能促使“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工业大国的“联合”，将出现一个裁减军备和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为此，考茨基祈求资本家不要为“资本扩张”而采取任何帝国主义行动，而应该联合起来。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的最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

考茨基只看到垄断发展与垄断间的联系加强的一面，而完全抹煞了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面。考茨基不愿意看到卡特尔不能拯救资本主义、消灭危机，而只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剧烈；国际卡特尔也不能消灭战争，而只能使重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列宁曾指出：“所谓用卡特尔来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00页）列宁还说：“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僧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

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結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間的‘暂时休战’。”(同上书，第 288—289 頁)

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继这篇《帝国主义》，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再鼓吹他的“超帝国主义”論，本书摘录了他的《两本論述重新学习的书》等四篇文章中的有关章节和段落，附在本文之后，以供讀者参考。不管考茨基把他的“超帝国主义”論如何精巧設計，目的无非在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轉移人民群众的視綫，麻痹他們的斗志，使他們只是坐待可能到来的所謂“超帝国主义”的虛假前途。无怪乎列宁认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論是“超等廢話”，除了“只会找到反动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此外再找不到任何別的东西”。

目 录

帝国主义 1

附录

两本論述重新学习的书(摘录).....20

再論我們的幻想(摘录).....38

帝国主义战争(摘录).....41

帝国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第五編第八章53

帝国主义^①

一、生产的比例性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这个詞今天随时随地都在应用，可是人們談得越多，討論得越多，它就变得越不确定，这当然就使人很难得到任何了解。今天我們已經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現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統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資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但是这种認識只是意味着最乏味的同义反复，除了說資本主义如果没有資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以外，什么也沒有說。

如果我們不是按照这种广泛的意义，而是按照这个詞的起源于英国的历史确定性来理解它，那么，它所指的就只是那些政治意图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政治意图固然是由現代資本主义产生的，但是决不等于現代資本主义。

大約一个世代以来，英国人把帝国主义一方面理解为把巨大殖民国家的所有部分同宗主国合并成一个統一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理解为越来越扩大这个国家的意图。在“大不列顛”以外的其

① 本文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已經写成。它本应刊登在准备为祝賀計劃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出版的那一期上。这次代表大会同其他許多事情一样，也由于近日的事变而告取消。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尽管它是純粹理論性的）却没有因此失去同实践的联繫，它是试图对說明实践有所帮助的。我們刊出本文时删去了与国际代表大会有关的地方，补充了一些对于战争的考虑。——《新时代》編輯部

他国家中，所謂帝国主义实际上只是指后一种意图，因为没有別的国家像英国那样拥有独立的殖民地。

但是并不是任何擴張本国領土的意图都可以称作帝国主义。否則我們就必須說帝国主义像有文字記載的历史那样古老了。通过合并由同一民族的成員居住的邻近地区来扩大国家的意图，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此，說什么塞尔維亚帝国主义，也是完全錯誤的。不能把标志着十九世紀的大部分的这一意图看作帝国主义，同样也不能把特别是在十八世紀十分强烈的获得极富饒的高度工业化地区的意图看作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資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資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麼民族。

要理解这种意图，必須首先弄清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农业和工业之間的相互作用。为了便于闡述，我們在下面把处于农业和加工工业之間的中間地位的采掘工业——矿业——撇开不談。

魁奈在他的《經濟表》中列出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两大部类，并且对以下問題作了考察：即如果要它們之中的每一部类都获得一切手段以繼續生产过程的話，这两大部类之間必須怎样进行交换。

同时他不仅把这一周轉过程看成商品的周轉过程，而且也看成資本的周轉过程。他不仅研究了农业产品怎样同工业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也研究了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須經過的途徑。尽管这是天才的表述，但是它的錯誤在于，魁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造成剩余价值的劳动。

馬克思一开始研究資本的周轉过程时，就不得不首先把农业同工业的差别撇开。因为在这两个生产部門中，每一部門的劳动，当它被資本主义式地使用的时候，都同样地造成价值和剩余价值。

但是，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資本的周轉时，也沒有把它的各个組成部分特有的物质形式撇开不管。

为了进行这一考察，他作出了一个不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区分，即关于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区分。就像任何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为了消費而进行生产，或者更正确些說，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者也是为了消費的目的而进行生产。只不过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各个生产者不是直接生产自己打算消費的那些消費品，而是为別的生产者生产消費品，以便再从他們那里为自己換来消費品。

如果要社会能够以它向来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那么它的成員必須有足够的消費資料。这就是說，消費資料要像他們所需要的以及他們掌握的价值所能够交換的那样多。如果消費資料生产得更多，那么它的銷售以及从而它的生产也要陷于停頓。

但是如果要生产为維持社会所必需的数量数量的消費資料，那么也必須具备必要数量的生产資料。如果生产出来的生产資料比制造消費資料所必需的要多，那末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滯銷，因而它的生产者就会被剝夺用它換来消費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資料生产得太少，消費資料的生产就会陷于停頓。由此可見，如果要整个生产过程毫无阻碍地进行，那么生产資料的生产同消費資料的生产之間就要始終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一比例随着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是确定的。如果实际情况同这一比例不相符合，那么它就要通过价格波动和危机来力求实现。

但是显然不仅是这两大部类之間必須存在应有的比例关系。还可以談得更詳細些，例如在消費資料項下区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分类。但是这往往是多余的工作，因为很难由此得到对資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新的認識。

只有魁奈所已經採用的分成工業和農業的那種分類法才是例外。當然，重農學派把這一區分應用到再生產過程上去的那種特殊方式是同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價值論相違背的，並且已經被馬克思永遠擯棄了。但是這並不是說，從這種區分中不能再汲取一些新的知識。

一九一〇年，我在評論希法亭的《金融資本》時，已經在《工業和農業》這一專章中指出過這一點。這一章的開頭幾句話是這樣的：

“為了認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怎麼可能仍舊一再達到生產同消費之間的平衡，我們還必須根據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物質特徵作進一步的區分。除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區分以及再把消費資料區分為奢侈品和日用品以外，還要加上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的區分。”（《新時代》，第二十九卷，第一冊，第838頁。）

大約在同一時期，我在我論述《自然界和社會中的增殖和發展》的書的一章（第十四章：《農業和資本主義》）中，以另一種方式闡述了目前生產方式中工業同農業的差別。

二、簡單商品生產

如果我們首先按工農業關係的最簡單的形態即按簡單商品生產來觀察這一關係，那麼我們最容易理解它。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工人是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者，並且把產品當作現成的商品送到市場上去，或者直接為消費者，為顧客製造產品。

最初，還在這一階段以前，工業活動是農業活動的一部分。工業活動是在農業經營中進行的，或者不如說，單個的經濟機體既是工業性的，又是農業性的，它生產食品和原料並且把原料加工成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那時已經有可能在經營的各個成員之間進行

分工。一批人能够以照料牲畜为主，另一批人能够以耕作为主，第三批人能够以紡織为主，还有一批人能够以把木材和金屬加工成工具为主，如此等等。然而在經營不扩大規模和不扩充人員的时候，这种分工是局限于它所不能超越的一定的范围以內的。反之，如果个别的生产者，也就是原料加工者，走出这一項經營，不是仅仅为这一項而是为几項經營进行生产，并且从它們那里取得原料和食品，那末分工可以远为更快地扩大并且發揮經濟上的优越性。

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但是再生产过程的不間断的繼續因而也就要依賴对工业的必需的农业供应的不断繼續。

农业(林业包括在內)永远是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工业活动有可能进行以前，农业必須先提供必需的食品和很大一部分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完全可以(至少是在原始条件下)在一个时期內不需要工业，但是工业却永远少不了农业。即使是在工具和农业劳动者的服装不更新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过程也可以按照向来的方式很好地繼續一个时期。相反，一旦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哪怕只是暫時停止，工业生产过程立刻就要停頓下来。

有两种途徑可以保证对于工业的供应。在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农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相互对待的时候，工业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徑，以价值規律为基础来获得自己的原料和食品。因此，只有当他們在农民之中找到他們的工业产品的购买者时，他們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农民必需向工业生产者购买一定价值量的工业产品，其大小同工业生产者所需要的农业产品相等。

只有当这两个部类的生产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还有另外一条給工业輸送原料和食品的途徑，即人們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这条途徑在历史上起过很大

作用，并且今天还在殖民政策中起着很大作用。但是我们打算把研究局限于纯粹经济性因素上。

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但是它经常有被突破的危险。一方面是由于乡村人口外流夺取了农业的劳动力来输送给工业，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知识界和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力易于提高。可见工业产品有比农业产品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因为生产者的数目和按生产者平均的产品数量在工业中要比在农业中增加得更快。

但是这种趋势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很少采取危险的形式。手工业的发展、它的生产率的增长是缓慢的。手工业中还不存在通过过度劳动来提高生产的趋势，因为工业生产者必需自己进行这种劳动。

不过，城市劳动力的数目由于农村人口流入而得到的增加，容易受到在那一时期的城市中往往很普遍的巨大死亡率的抑制。即使在这种死亡率不能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地方，愈来愈大的供应困难也会使它受到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取决于交通道路的状况；后者决定城市人口获得他们的原料和食品的地区范围。这个地区越小，城市就必需越小。从前的交通道路通常是很糟的，甚至水路在航行技术不足的条件下也常常很少得到利用。因此为城市工业提供生活泉源的地区是很有限的。

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扩展因此很快就受到了限制。通过增加手工业者的劳动负担来扩大工业生产的动力是微弱的，通过增加城市工人的数目来扩大这种生产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三、资本主义生产

由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巩固和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代替，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大才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

资本家(作为一个资本家)并不亲自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使独立的手工业者无法过度延长工作时间的障碍对资本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注意，这里说的是手工业繁荣时代的手工业者，他们还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而被迫也极度折磨妻子、儿女和学徒。

资本家使他的工人为他劳动。工人的劳动痛苦他是不以为意的。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延续得愈长，就愈成为他的乐趣，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超过工资数额的剩余价值就愈大，他的利润、因而他的收入也就愈大。

但是个别的资本家能够不仅靠延长工时来增加生产。这种延长不管多么冷酷无情，总有体力上的限度。反之，工业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却没有类似的限度。是十个，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个，这只取决于他的钱袋的大小。但是每多一个受雇的工人都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额、也就是他的收入额的增加。

当然，资本家雇用工人作工的方式不是取决于他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如果他剥削一千名工人，那么他也许起初不得不作为包买主使每一个人都作为家庭工人在家里劳动。但是当他一旦同时雇用了许多工人，也就产生了把全体或某些工人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并且使他们集体劳动的可能性。因而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经营的先决条件，这种大经营发展成了手工工场、工厂和现代的巨型企业。而且至少到现在为止，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多，而一个工厂的生产资料(厂房、机器、原料)规模的发展还要快得多，使用一个工人所要求的资本额增长得愈来愈快。

因此，随着各个资本家的利润总和的增长，在这一总和中资本家(如果他要继续增殖他的利润总和的话)不应当消费掉的、而是必须储蓄和积累起来的那一份额就相应地增长。然而，资本积累

的可能性在农业中远沒有在工业中那么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微小的积累可能性理解成这样：从事資本主义生产的农业家和大地主聚集資本的可能性比工业家要小一些。但是农业家所积累的每一笔資本并不都因而就成为农业資本。它还可以用股票的形式被投放于工业或铁道等等。在一定的地区內把聚集起来的資本用于农业即扩大农业中的資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要比同一地区的工业的資本主义扩展的可能性小一些。原因在于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因素。

农业所从事的是活的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通过增加所花費的劳动来随心所欲地加速或扩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反之，工业只要拥有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能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在农业的一个經營中增加工人数目要比在工业中困难得多，因为工业摆脱土地束縛的程度比农业大得多。如果一个工业資本家拥有必要的資金，那么他在把一个雇用十名工人的企业扩大成雇用一百名工人的企业时几乎不会感到缺少場地的困难。他所需要的用来扩大工厂或新建更大的工厂的那些土地，通常是随时都能找到的。而农业家就完全不同。如果他打算把所雇用的工人增加到十倍，那么在經營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就必須把拥有的土地扩大十倍。但是，这样做时就要在四面八方同他的邻人的私有財產发生冲突，如果他要扩大自己的經營，就必须排挤他們。这在多数場合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他成功了，那末，在前面所說的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他的邻居所失去的土地以及因而失去的工人同他所得到的是一样多，全国农业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并没有增加。在一个土地已被占有的国家里，在經營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扩大个别农业經營的規模，同时增加經營的数目，以及增加整个农业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是不可能的。反之，在工业中，即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厂的平均規模、工厂的数目以及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是完全可能同时增长的。

技术发展本身对工业的影响和对农业的影响又是不相同的。技术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使工人数目同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比例减少下去。然而在工业中这种减少在多数场合至今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引起工业工人数目的减少，而只是使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量比被雇用的工人数目更为迅速地增长。

在农业中却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工人数目的减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往往也是绝对的。

这些差别的影响由于在考察简单商品生产时已指出过的那种情况而更为加强了：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情况下，农业始终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农业不断地供应新产品，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反之，在必要时我们却能在一个时期内忍受缺乏一大批工业品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是每天都得到面粉和牛奶、肉和蔬菜的供应，那么我们在城市里就会生活得很坏。反之，我们不会因为把已经穿戴破了的衣帽继续穿戴一个时期而毁灭。例如棉纺业主在棉花不能源源供应时就不能继续开工；但是如果他的纺机陈旧了，而他又找不到或不想购买新的机器，那么他也许还能再继续用它们一年，当然这样做是很费劲的。

但是不仅如此。

农业的大宗产品远不如工业的大宗产品那么多多种多样，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变化也要少得多。谷物和牛奶、肉和土豆到处都是最主要的食品；它们不受时尚的影响。反之，如果有人要购置一件新的上衣，那末有多少种衣料可以供他挑选！而衣料的时尚又变化得多快！一个想购置纺机的纺纱业主，也可以在无数种类中挑选，而技术的进步会促使越来越新、越来越好的机器出现。

这一切就使竞争、即各企业彼此之间争夺销路的斗争这一个在农业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只有微小意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

的工业中发挥出全部威力。工业家为自己的产品争取销路必然比农业家困难得多。如果农业家遇到销售困难，那么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其他农业家，不如说是在于中间商人。

资本积累得越多，农业越是落后，工业人口越是增长并要求越多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人口相反地越是减少并且因而他们全体对工业品的需要量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对工业也就越不利。

但是在竞争的斗争中较大的和技术较完善的企业同较小的企业比起来，站得住脚的希望更大。竞争的斗争越激烈，每一个工业企业也就更加必须设法发展、扩大并且以最完善的技术装备起来。

我们一向只是从资本积累使个别资本家生活舒适的观点来考察它，资本家通过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高自己的利润并从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我们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认识它。它不仅为工业资本家提供听他自由地加以利用或者不加利用、可以按照他的愿望而放弃的利益。资本积累愈来愈成了资本家所必需的了，资本家没有它就不行。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企业和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产品销路，现在已成了资本家的生存条件。他的产品的增加已不再仅仅是对产品的需求增加的结果。现在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没有自发地相应增加的话，那么他必需用一切力量来人为地提高需求，扩大市场。

工业中竞争的强度是下一情况的结果：在工业中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的欲望和可能性比在农业中大得多；而这一推动力又从一种结果变成扩大工农业之间差别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工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尽快地发展，否则社会就会陷于极大的不幸。农业越来越多地把工人挤出去。即使在农业工人数目保持不变的地方，农业还是要把增加的人口全部推向城市。工

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如果工业不迅速发展，结果就是可怕的失业。另一方面，竞争越是疯狂，它也就越加迫使资本家扩大和改善自己的企业。但是如果对于相应地扩大销路稍有疏忽，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破产。

但是工业要得到发展，农业就必须以同样的规模增加自己的产品和人口；它必须以和工业需求的增长相同的规模来增加原料和食品的数量；而且它必须相应地消费更多的用来购买农业产品的工业产品。

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比农业中快得多，这是怎样才有可能的呢？

马尔萨斯所认为的**人口的自然规律**，即人口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前者按一、二、四、八、十六这样的几何级数增长，后者按一、二、三、四、五这样的算术级数增长，这已经被证实是一条资本主义**积累的经济规律**。但是这并不比下面这一规律更少令人痛苦：一个地区的工业人口按一、二、四、八、十六增长，而同一地区的农业人口却保持稳定或减少。而同时工业中每个工人的产品量比农业中增长得快。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供应者和购买者只限于在它们萌芽时为它们服务的那一地区的话，那么资本积累实际上即使不是不可能，毕竟也是非常困难和被限制在狭小范围之内的。只有当工业使作为供应者和购买者而为其服务的那一农业地区不断扩大（这使交通工具的不断扩大和改善成为必要）的时候，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才能毫无阻碍地进行和自由地发展。

四、积累和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以各种生产部门都

按恰当的比例生产为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却存在着突破这种比例的经常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使一定的地区内的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得多的趋势。这在一方面成为周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周期性危机经常是工业危机，这时各种生产部门的恰当比例可以一再重新建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能力愈强，要求扩展为工业提供食品和原料而且也提供消费者的农业地区的欲望也就愈强烈。

农业地区对于工业的意义是双重的，因此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由于工业产品在农业地区的销路不像工业生产增长得那么快，这就表现为**生产过剩**。还有时是由于农业所提供的食品和原料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所要求的那么多，这就以**物价高涨**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两种现象看起来似乎互相排斥，却又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只要造成它们的是工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调，而不是其他原因，例如黄金生产的变化或是由卡特尔、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等引起的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力量对比上的变动。物价高涨和生产过剩这两种现象中的任何一种，如果是由上述比例失调产生的，也就很容易转化为另一种。价格上涨经常形成危机的序幕，这种危机以生产过剩的方式出现并且引起物价暴跌。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民族的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也可能采取各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证明了这种意图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还远不足以证明这些形式中的某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就是这里所讨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它以前有另外一种形式，**自由贸易**的形式。自由贸易在半个世纪以前，正像帝国主义在今天一样，被看成资本主义的顶峰。

自由贸易通过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优势取得了统治。大不列

顛應該是世界的工場，而世界則應該成為購買英國的工業產品並且為此向英國輸送食品和原料的農業地區。一切參加者都有利可圖的**自由貿易**可算是使這一農業地區一直按英國工業所需要的規模發展的至高無上的手段。事實上，向英國輸出產品的那些國家的大地主，正像英國的工業家一樣，是頑固的自由貿易派。

雖然如此，這個國際協調的美夢很快就結束了。工業地區通常是勝過並且統治農業地區的。過去城市對鄉村是這樣，現在工業國對農業國也是這樣。一個保持為農業國的国家，會在政治上而且多半也在經濟上逐漸衰退，在兩方面都會喪失獨立。因此，保持或取得民族的獨立和自主的意圖，在國際的資本主義周轉的領域內必然到處產生建立自己的大工業的意圖，這種大工業在現有的條件下是資本主義的。外國工業產品在農業國的銷路的增长本身就為實現上述要求創造了一系列先決條件。這一增长破壞了本國的資本主義前工業，從而解放出許多勞動力作為僱傭工人供資本使用。這些工人如果在本國用不上，就會跑到其他工業發達的國家去，但是他們還是寧可留在國內，在那裡他們可以使資本主義工業的建設更加容易。外國資本本身起初為了通過修築鐵路來開發農業國而流向那裡，後來也為了發展它的原料生產，其中不僅包括農業，而且也包括採掘工業，即礦業。用其他的資本主義企業來補充這些資本主義企業的可能性不斷增长。一個國家是否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工業，這主要取決於它的政治力量。

首先是西歐各國和美國東部各州同英國的工業相對立而從農業國發展成工業國。它們以保護關稅來對抗英國的自由貿易。它們用大工業國對於世界上還沒有被占領而又無力抵抗的那些農業地區的瓜分來代替英國所追求的、在英國的工業工場同所有其他地區的農業生產之間的世界分工。英國對此進行了反擊。帝國主義就這樣產生了。

帝国主义特别受到了与它同时出现的向农业地区的資本輸出制度的促进。

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現在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它們到上一世紀七十年代为止采用的扩大市場的那些方法已不再够用了。在那以前，人們满足于利用农业地区現有的原始运输工具，主要是利用水道，食品和原料的大宗运输从前只有通过水道才是可能的。在那以前，几乎只有在高度工业化的、人口稠密的地区才建筑铁路。到了那时，铁路却成了开发人口稀少的农业地区、使那里的产品能够运往市場、而且也使那里的人口和生产增加的手段。

但是这种地区却沒有任何办法自己修筑铁路。所需要的資本和主要劳动力是由工业民族供給的。工业民族出借資本，从而提高了铁路材料的輸出，但是同时也增加了新开发地区用食品和原料来购买資本主义民族的工业产品的手段。农业和工业之間的物資交换就这样大大地增加了。

为了使荒凉地区的一条铁路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甚至仅仅为了使它成为可能，为了得到筑路所必需的劳动力，为了使铁路的經營和它的要求得到必要的保障，就必需有一个国家政权，它既是足够地强大和殘暴，足以保护外国資本家的利益，同时又对这些利益盲目效忠。这件事由这些資本家自己的国家政权来管当然是最好的。这也适用于凡是有可能开采丰富的矿藏、或者通过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而增加經濟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的地方——这些企业同样只有通过資本主义国家的資本輸出才有可能。

这样，随着工业国家扩大向世界农业地区資本輸出的欲望的增长，使这些地区服从它們的国家政权的意图也就加强了。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因素：資本輸出能够在它趋向的那一农业地区产生好几方面的影响。我們已經指出，一个农业国在今天的处境是不好的，为了繁荣，甚至为了独立，它都必须力求成为

工业国。那些拥有维护自己的独立所必需的力量农业国家，不仅利用输入的资本修建铁路，而且还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例如在美国和俄国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仅仅暂时促进了自己的工业出口。它由于在农业地区促成了强烈的工业竞争而很快就使这种出口趋于停顿。对抗竞争的愿望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把农业地区直接地当作殖民地或者间接地当作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这是为了阻止农业地区发展自己的工业，为了迫使它们只限于从事农业生产。

这是代替了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源。

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政策的最后可能的表现形式，还是还可能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扩大资本主义内部工农业之间交换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吗？

问题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在农业国家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的生存所必需的了。资本家阶级既然不想自杀，那么它就不会放弃这种做法，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统治农业地区，把那里的居民压抑成无权的奴隶，这同上述要求联系得过分密切，以致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认真地起来反对。只有当这些地区的居民或者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粉碎资本主义枷锁的时候，对这些地区的奴役才会结束。

帝国主义的这一面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被消灭。

但是帝国主义还有另外的一面。占领和奴役农业地区的要求，引起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对立促使从前只在陆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发展成为也在海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这些对立是使早就被预言的世界大战现在成为事实的最后根源。难道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存

在所必需的，只能随着资本主义本身一同被消灭嗎？

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就不会存在继续进行軍备竞赛的經濟上的必要性了，即使从资本家阶级本身的立場看来也是这样，至多从一些同軍备利害相关的人的立場看来还有这种必要性。

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經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的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見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

我們在这里首先看到了比較发达的农业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它不仅是威胁着这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威胁着它們全体。东亚和印度的觉醒以及西亚和北非的泛伊斯兰教运动都是这样的。

此外还有工业国无产阶级反对由新稅引起的任何額外負担的日益增长的抵抗。

除了这一切，还要加上在战前就已經出現的一个严重現象：自从巴尔干战争以来，軍备竞赛和擴張殖民地的費用已經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資本积累的迅速进展和从而使資本輸出、也就是使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本身受到了威胁。

国内工业积累靠着技术的进步照旧进行。但是資本不再迫切要求輸出了。这一点已經由下面的情况表示出来，即欧洲各国甚至在和平时期偿还內債已經有了困难。它們所必須承认的利率提高了。

例如下面两种債券的平均市价是：

	三厘德国公債	三厘法国公債
1905年	89	99
1910年	85	97
1912年	80	92
1914年中	77	83

如果軍备竞赛及其对資本市場的需求在战后繼續增长的話，这一情况不会好轉，而是要恶化的。

帝国主义就这样为自己挖掘坟墓。它从发展資本主义的手段变成了阻碍資本主义的手段。

資本主义还不一定因此就到了穷途末路。从純粹經濟观点看来，它能够繼續发展，只要老資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的工业还有可能促成农业生产的相应扩展；当然，这种扩展会随着世界工业每年增长幅度的日益提高和尚未开发的农业地区的不断縮小而越来越困难。

在沒有达到这个限度以前，它固然可能因为无产階級日益增长的政治反抗而垮掉，但是它不一定会由于經濟崩潰而毀灭。

反之，繼續执行目前的帝国主义政策，将过早地引起这种經濟破产。

这一帝国主义政策不能再长期繼續下去了。

当然，如果目前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繼續进行是不可缺少的話，那么剛剛提到的那些因素就不能对統治階級产生深刻的印象，也就不能促使他們給自己的帝国主义意图以另一个方向。但是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即任何資本主义大国在同其他类似国家的对抗中扩大自己的殖民国家的意图，仅仅是促进資本主义擴張的許多手段之一的話。

人們可以用馬克思有一次关于資本主义說过的話來說帝国主义：壟断产生竞争，竞争又产生壟断。

大企业、大銀行和亿万富翁的瘋狂竞争使并吞了小財閥的那些大財閥产生了卡特尔思想。因此現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将結束軍备竞赛。

可見从純粹經濟的观点看来，資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

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我們当然必須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不过它的危險不在軍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

这里所作的闡述是在奥国以它对塞尔維亚的最后通牒使我們震惊以前写成的。奥国同塞尔維亚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意图。在东欧，民族主义还起着革命动力的作用，奥国同塞尔維亚目前的冲突既有民族主义的根源，也有帝国主义的根源。奥国試图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它吞并了波斯尼亚并且正打算把阿尔巴尼亚也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奥国就这样激起了塞尔維亚的民族主义反抗，塞尔維亚感到受奥国的威胁，而它自己又成了对奥国生存的威胁。

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对奥国來說是一个必然性，而是因为，奥国由于自己的结构，自己受到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只有内部团结得很紧并且吞并了文化上远比自己落后的农业地区的国家才能实行帝国主义。这里却是一个民族上四分五裂的半斯拉夫族国家想牺牲一个斯拉夫族的邻国来实行帝国主义，而后者的文化同对方的比邻地区的文化是同出一源的。

这一政策当然只有通过帝国主义在其他大国之間造成的对立和恶感才能引起如此意外的惊人的結果。当前的世界大战所孕育着的后果还没有全部表现出来。世界大战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帝国主义意图和軍备竞赛首先加剧——这一来，继战争而来的和平就只是一次短暂的休战。不过从純粹經濟观点看来，已經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这次强烈的爆炸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战争持續得愈久，它愈是使一切参战国筋疲力竭并且对武装交鋒的迅速重演感到畏縮，我們也就愈加接近后

一种解决办法,虽然它现在看来还是很不可能的。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写成,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发表。

载于《新时代》第三十二卷(1913—1914年)
第二册,第二十一期,第908—922页。

附 录

两本論述重新学习的书(摘录)

四、帝国主义的概念

庫諾在这本小书^①中所使用的仅仅限于暗示的方法，在他談到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并且斥責那些否认帝国主义必然性的同志的那一章中，恐怕是表現得最討厭的了。沒有几个詞像現在的帝国主义一詞这样被如此普遍地、当作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来处理 and 提到。的确也沒有几个詞像帝国主义这个詞一样在理解和使用上如此多种多样。如果庫諾由于某一作者对帝国主义的观点而同他論战，那他至少必須說清楚这个被攻击的人对帝国主义一詞所下的定义。但是庫諾不仅忽視这点，而且他根本迴避任何逐字逐句的引文，对所有关于帝国主义的論述一視同仁。我簡直沒有把握断定，庫諾在論战时心目中是哪几个作者。庫諾的分析会促使不熟悉我們的书报的广大公众得出結論，认为整个社会民主党內不但在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上、而且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上都是惊人地混乱不堪。不过，难道庫諾打算造成的不就是这种印象嗎？

在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一定会使人相信我們在帝国主义問題上是一窍不通的。他說：

^① 指考茨基在本文中評論的《党的毀灭嗎？》(柏林一九一五年德文版)一书，本文中所引庫諾言論后面注的頁碼就是这本书的頁碼。——譯者注

“我不得不承认，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论述：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同过去那些发展阶段例如大的机械工业的形成一样，也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的、金融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发展时期，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过是进一步的、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原来的工业资本，而是当权的金融资本”。（第14頁）

讀者很容易从这段阐述中看出这样的责难：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我们的理论忽视了研究“进一步的、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原来的工业资本、而是当权的金融资本”。

但是“金融资本”这个用语就已经使人想到希法亭的书，正好是在这本书中，对库诺所要求的东西作了最详细的、最彻底的探讨，并且创造了“金融资本”这一**技术名词**。这些探讨已经得到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一致承认，而库诺却出来抱怨说：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一类论述！他倒是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的书报中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时期的理论研究方面已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科学。库诺不谈这点，却让人得出我们的理论已经破产的结论！

他继续说：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然阶段，那么‘我们不当容许帝国主义兴起；我们必须铲除它’的这一要求就同如果人们在机器大工业初期说这样的话一样愚蠢了：‘不能容忍任何机器。我们要毁掉机器，而且我们要规定从今以后只许用手工业方式生产’！”

我们又一次不知道是谁说过被他这样论证的“蠢话”。库诺把

狹隘的手工业师傅拿来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相比，这些手工业师傅以为死守过时的行会制度能够使他們抵抗資本主义大工业的胜利进军。“如果认为可以简单地堵塞資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道路，并且阻止它的兴起，这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地可笑嗎？”

关于帝国主义这一“經濟阶段”，他继续这样說：

“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的准备阶段，它使最重要的生产部門日益落入巨大的資本联合的手中，使生产领导同生产資料的所有制脱离，使技术上互相关連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工作，使剝夺过程加速和集中，从而为社会主义經濟方式創造了某些組織上的前提条件……

“如果帝国主义在当作經濟現象来理解时是資本主义的一个受經濟历史条件制約的发展阶段，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那末就不能简单地将它阻止或者鏟除——对于这一点，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中的个别聪明人也是懂得的（自然他們的多数是完全看不见这种矛盾的）。但是他們拘泥于資本主义彻底破产的教条，不放棄他們的幻想，却声明說，經濟历史的必然性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历史必然性，或者不是充分的历史必然性，而仅仅只是一半的，也許甚至只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历史必然性——最后他們通常是在大大地把概念引伸和扩展了一番以后得出結論說，**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不是必然性，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第 15 頁）

我們还是不知道，在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之中，发表这种愚蠢看法的而且还是“聪明的”人是誰。庫諾继续說：

“但是究竟为什么虽然帝国主义在經濟上是以資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得到充分發揮的内部生命力为基础，却不算是历史必然性呢？他們說，这是因为人們还可以对发展作另一种設想，因为資本主义除了通过总是会招致新战争危險等等的殖民扩张的道路以外，也許的确也能通过别的道路来同样发展它的力量。

“而且人們还說这种空想的、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察方法是严格的馬克思主义的！不仅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說，而且对于每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学說來說，需要探討的問題完全不是在別的情况下也許可能发生什么事物以及人們是否能够設想发展朝另一方向进行，需要探討的仅仅是存在的事物，就是說，由历史地現存的前提所产生的，并且实际上已經存在的，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貫徹的事物。凡是在发展系列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的事物就是历史地必然的事物。个別人是否能够对这种发展作別的設想，个別人是否喜欢它，它是否符合他們的道德观念，它是否会招致战争危險，这同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約性和必然性都沒有关系。”（第 16 頁）

庫諾的話引到这里为止。我之所以詳細地引述他的話，是因为讀者只有在根据双方自己的話来精确地了解双方的論据时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庫諾的論证是由于他把帝国主义和現代資本主义等同起来而产生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不过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資本主义”，是一个“經濟阶段”，这个阶段的本质在于資本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們认为这个定义正确，庫諾对于“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把他們看成同那些想用手工来代替机器的人一样。沒有一个帝国主义的消灭者要求現代資本主义向落后的方法倒退。庫諾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他們反对帝国主义是以关于“資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的“教条”或“幻想”为根据的。由此可见，他們并不想用資本主义的一个过去的阶段，而是想用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資本主义的最現代阶段。可見那些反帝国主义者毕竟不是同“狹隘的手工业师傅”“完全一样地可笑”。

但是当真人們必須把帝国主义和現代資本主义等同起来嗎？

难道这样做也算合适嗎？

許多帝国主义的消灭者，連我也算在內，不贊成这样的等同。庫諾尽管可以认为这是錯誤的，不过他就必須針对这一点进行批評。他的目前这种形式的全部辯論都沒有打中我們，而且也不能帮助人們弄清我們对帝国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些辯論沒有使公众看清基本的分歧。

关于帝国主义一詞的意义的問題，看来也許是單純的字眼爭論或者完全是咬文嚼字。但是我們除了通过詞句以外沒有別的办法能够互相了解。而且只有我們大家都將同一个概念与同一个詞結合起来时，才能够了解。因此个人也沒有权利任意選擇个别現象和概念的名称。語言是社会的产物，个人在選擇自己用的名称时是受語言习惯和社会机体的活动約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个人要确定一种在他以前沒有人知道、或者至少是辨别得不够精确的新現象或新概念时，他才有权自由选择名称。但即使在这时，向来的語言习惯也会給他立下一定的准則。

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我們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我們就必須問問自己，这个詞是怎样产生的，它一向表示的是什么东西。这个詞是从拉丁文来的，它表示同一个世界帝国或是凱撒帝国(imperium)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图。就我所知，它最初在拿破侖第一的帝国統治下的法国出現，人們用它来表示帝国的政策。如果法国同志們今天还把帝国主义这个詞按照相似的意义用于德国，用来表述他們相信能够在德国发现的帝国政权取得世界霸权的意图，那么，原因多半是在此。庫諾理解錯了，他认为法国同志是在这一意义上說德国帝国主义的，即他們相信，資本主义的最現代阶段只限于德国。其实，他們想都沒有想到这一点。他們使用这个詞同我們例如說法国波拿巴主义或是俄国沙皇制度的意义是相似的。

这个詞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在英国还有另一种意义。人們用它来表示通过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間結成紧密联盟来用大不列顛代替小不列顛的意图。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大帝国 (empire)。因此人們也还用它來說明一种特殊类型的**帝国政策**，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殖民地**的兴趣。特別要通过**关稅政策**的特殊措施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紧密結合。但是这一来，不断增长的对殖民地的兴趣也要导致新地区的占領，从而导致同其他强国的对立和建立海軍軍备。

在其他的資本主义强国中，这种追求一个殖民地大国和軍备的相似意图也出現了，一部分国家早一些，一部分国家与英国同时。英国沒有首創这种新政策，不过給它起了名字。这种政策一般称做帝国主义。

我們馬克思主义者不滿足于描述这种意图。既然它們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出現，我們认为其中有一种規律性，并且研究了它們的原因。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做了庫諾現在在我們著作中找不到的那件事的人，即研究新的帝国主义如何从資本主义的新的內部条件生长出来。在我的发表于一八九七——九八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組論文《老的和新的殖民政策》^①中，我已經指出，帝国政策或世界政策的新类型是工业資本发展、財政巨头的重要性的增加和資本輸出的結果。然后希法亭一九一〇年在他的关于金融資本的著作中第一次指出，資本的最現代阶段怎样导致貨幣資本特別是銀行对于工业資本的支配，从而完全改变了工业資本的性质。他称这一新时代为**金融資本**。他用这个詞來說明：“銀行資本，即貨幣形态的資本，它用这一方式在現實中轉化为工业資本”（《金融資本》，第 283 頁）。他非常注意避免用人所共知的“帝国主义”一詞

^① 見《新时代》第十六卷（1897—98年），第一册，第二十五期，第 769—781 頁。——譯者注

来表示資本主义的这一最新阶段。他也用帝国主义这个詞来表示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表示一个“經濟阶段”。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金融資本偏爱的政策。

我相信，我們有一切理由坚持对于作为原因的金融資本同作为結果的帝国主义的区分。这一区分符合把帝国主义理解为政策的一种特殊体系的这一語言习惯。論述帝国主义的不同作者对这一政策的細节理解不同，但是几乎全体一致把帝国主义看成政治制度，不是“經濟阶段”、不是“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資本主义”，而是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家阶层的政策。

帝国主义正像它所代替的曼彻斯特主义一样，是資本主义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曼彻斯特主义也并不表示某一个“經濟阶段”，虽然它也必然是同一个經濟阶段相联系的。

庫諾直接把这个詞用来表示“进一步的、加强了的資本主义”，我不能认为这是改进，因为它的表述某一种政策用途仍旧保持着。对于我們称为帝国主义的那种政策，庫諾并没有創造出新的名称，因此他的見解仅仅产生这样的結果，即两个不同的現象有着相同的名称。由于二者彼此处于密切的联系即原因同結果的联系之中，这就更加容易造成混乱了。

如果人們与此相反，坚持对金融資本和它的政策即帝国主义作出准确的区分，那么問題就不是像庫諾所提出的那样了：难道我們想跳过那一由工业資本的集中和它同貨幣資本的融合而产生的經濟阶段嗎？問題应当是：无产阶级是应当参与或完全支持由金融資本家执行的政策，还是应当反对金融資本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执行自己的特殊政策？

人們如果这样提問題，那么庫諾也就只会像“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一样回答，如果人們可以根据他一向的态度来判断的話。他自己也隱約地提到过，他說：

“这根本不是說，工人階級应当耐心地和不加反抗地忍受帝国主义的統治。对于以前的資本主义发展阶段，他們也一向沒有这样做过！不如說社会民主工党負有这样的任务：尽可能抵制帝国主义的有害后果，另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利用那些能給工人爭来某些东西的經濟改組来为工人階級謀利益，扩展工人階級的組織，并且如有必要的話，改造这些組織来适应新的目的，一句話，通过新的发展时期使工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尽可能保持元气。另一方面，必須使工人階級不断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或者像通常所讲的那样夺取政权，并且把这个政权用于以下的目的：使經濟发展的好处不仅对資本寡头政治有利，而是也由国家和工人分享愈来愈大的份額，此外还使国家日益加强对大生产的最重要部門和財政經濟的最重要部門的監督，并且在一旦条件具备时，把这些部門納入国家管理。

“但是，不让資本寡头政治得到供它的利潤貪欲进行活动的場地的政策，是和無論如何不許帝国主义得勢、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必須消灭帝国主义的等等廢話完全不同的。这种空話同那些认为根本不应当容忍大工业、金融、以及整个資本主义本身存在的要求完全处于同样的水平。”（第 19 頁）

可惜，庫諾在这里的說法仍旧沒有使人看清他对真正的問題的态度。从上面的闡述看不出他对殖民政策、軍备竞赛、关税政策采取什么态度。因此我們在这里也要担心，在圍繞这些当前問題的斗争中，他的小册子所起的影响同它所希望起的影响剛好相反。它不会把我們对这些問題的見解闡述得更加明了，反而会被金融資本及其政策所利用，特别是因为它十分有力地強調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五、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的概念已经是众说纷纭的了。但是必然性的概念也是一样。只要一谈到帝国主义的必然性，那么即使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人们中间也有可能产生极其多种多样的误解。简短的暗示一定会在他们中间造成不折不扣的误解。但是在像帝国主义问题这样一个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此重要和如此争论纷纷的问题上的误解可能成为十分致命的。

在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怎样判断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以前，我们必须就对它的理解取得一致。

让我们回想一下上一节里的引文。库诺坚持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并且用下面这些话来论证它：

“凡是在发展系列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的事物，就是历史地必然的事物。个别人是否能够对这种发展作别的设想，个别人是否喜欢它，它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念，它是否会招致战争危险，这同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和必然性都没有关系。”

他在这段话以前说，需要探讨的“仅仅是存在的事物”。（第16页）

如果人们想到的只是历史性的解释，那么完全可以承认这一点。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必然地成为它现在的样子的，它只能被看成处于它的必然的联系中的必然性事物。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就这一意义来说，“只要是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不仅帝国主义是必然的，而且保守党、三级选举制、拉狄克和博尔夏特同志以及他们对于帝国议会党团的批评都是必然的。如果说，想“铲除”某一必然的事物就是“愚蠢”，那么人们也就不应当尝试

“鏟除”上述現象中的任何一个了。

但是按剛才确定的这一意义說来，必然性概念同鏟除以及一般同任何行动都是不相干的。这一意义只适用于观察着的人，不适用于行动着的人，它是从經驗、就是說从对于过去的研究得来的。但是人在其中生活的現在形成了过去和将来之間的分界綫，而过去和現在是两个十分不同的世界。（參看我的《倫理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6頁，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論述）

我对于将来毫无經驗。我能够把过去的經驗延伸到将来，我能够根据这一假設，即同样的原因在将来会像在过去一样产生同样的結果这一假設，为将来作出結論，对将来抱有期望，但是只有在我已經精确地認識历史地形成的、决定将来的那一切原因的时候，我才有絕对的把握认为这些結論和期望会实现。既然任何人都~~不~~具备这样的認識，我們就只能以較大或較小程度的精确性認識将来的必然发展。这时我們要探討的不是确定性，只是可能性和盖然性。

庫諾取笑“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中間的那些他沒有指名的“聪明人”，因为他們說，經濟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不是正确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半的、也許甚至只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必然性——我却不知道有誰会发表这样荒謬的意見。但是他心目中所有的并且漫画式地复述了的这一思路，显然不是說的已經形成的帝国主义，而是說的它的将来。沒有人想否认，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仅就这一点來說是必然的。这是仅仅凭帝国主义是存在的这一点就已經证明了的。爭論的問題是，它在将来是否必然的，而对于这一問題，不能以絕对的确定性，只能以較小或較大的、用庫諾的話來說就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盖然性来回答。仅仅認識到，帝国主义是存在着并且是从既定的条件必然地像它現在这样地产生出来，因此它同随便什么别的現存事物一样，不是偶然的

产物，这一认识还不能帮助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将来**得到丝毫的了解。

必然性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迄今只从认识着的人的立场来讨论它。这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采取的立场。相反，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人类只要不是作为单纯的哲学家来对待世界，从来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必须这样做。人不仅在过去和将来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生活，而且始终在两个世界中生活，他同时也不仅是一个认识着的个人，而且也是一个行动着的个人。他必须行动，不管他是否愿意。世界以敌对的和友好的现象面对他，他只有通过利用或支持后一类现象，防御或消灭前一类现象，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

在这一活动中，仅仅确信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必然的，对他毫无用处。他在这一方面的任务不如说是在于，**对他来说**什么是必然的或者不是必然的、有时是有害的。“必然的”一词恰好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两种意义必须严格分开，但是容易彼此混淆：有时它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东西，有时是指为了**满足我们的一定的需要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我们的行动中对于两种类型的必然性都必须加以考虑。一种必然性决定行动的**目的**，另一种必然性决定行动的**条件**。对于过去的一定的必然联系的认识是行动者所不可缺少的。由于他的经验向他指明，一定的原因引起一定的结果，这就推动他通过“不让”引起不愉快的结果的那些原因“发生”或者把它们“铲除”的办法来避免不愉快结果，通过为受欢迎的结果造成原因的办法来导致受欢迎结果。

斑疹伤寒和体虱是和帝国主义同样“必然的”，尽管如此，人们能够干这样的“蠢事”，即通过要求“铲除”虱子而打算“不让”斑疹伤寒“发生”。这一反对有害结果的已知原因的斗争，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或集团，无论对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行为还是对社会现象的行为，都是适用的。对于那些仅仅研究“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的哲学家来说，这一制约性肯定是同“是否招致战争危险”这一问题毫无关系的。但是对于实践的政治家的行动来说，某种确定的政策是否适于“招致战争危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从实际政治的立场来看，关于帝国主义的必然性的问题并不是说它是不是在历史过程中以必然性形成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而是说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构成一个必然性，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否需要它。帝国主义的捍卫者今天是这样主张的，他们断定，工业以及从而无产阶级没有殖民地、没有强大的舰队、没有高额关税就不能存在，因此帝国主义是必然的。库诺一直反对这种必然性，他一直同我们联合起来捍卫这样的见解：那种类型的政策对工业害多利少。如果说他现在热烈地为帝国主义的必然性辩护，那么这就显然很令人担心，担心所有把帝国主义理解成一个实际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的人会认为，库诺在战争的影响下背叛了自己。他所嘲笑的已经破灭的幻想是他自己的见解，他在战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主张这种见解的。

他肯定不是打算通过他的阐述来取得这样的结果的。

但是如果我们反对一种现象，我们往往不应当满足于单纯的否定。把这一现象从必然的联系中取出来时，不可能不留下一个必须加以填补的缺陷。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反对坏东西，我们必须建议用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这一更好的东西当然必须是可能的，就

是說是可以根据現有的物质条件达到的。在这一方面經驗即对于过去的必然联系的認識也帮助我們。經驗使我們認識，为了造成合乎願望的結果，我們必須排除什么原因或者导致什么原因。但是它也向我們指明，这一方面的前提具备到什么程度。我們的行动的出发点必須始終是**存在**的事物，就是說**必然**的事物，但是我們的活动的目的必須始終超出此外。

但是如果我們事先沒有認識到，就是說想到那一目的是可能的，那么它是根本不能达到的。任何新的机器，任何社会改良，都不可能被人設想以前实现。固然經驗也許还可能导致多种多样的变化，使它們最后成为和原来設想的不同的样子；但無論如何它們必須首先經過設想。

这是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致我根本不会想到要特別說明，如果庫諾沒有嘲笑那些根据以下的理由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

“这是因为人們还可以对发展作另一种設想，因为資本主义除了通过总是会招来新战争危險等等的殖民擴張的道路以外，也許的确也能通过別的道路来同样发展它的力量。”

这种嘲笑看来的确簡直像是为殖民政策辯护！

为了已經形成的、并且距离我們已經很远以致不再能为将来带来任何实际后果的事物去問是否曾經有可能設想另一种发展，当然是多余的。但是庫諾难道竟打算断定，对于将来來說，除了金融資本的政策以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可以設想的政策嗎？全部社会主义如果不是依靠把未来的发展設想成与过去的发展不同才能成立，那么是依靠什么呢？

当然現實可能違背我們的期望，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說我們畢竟打算設想未来的发展，并且沒有这种設想我們就会一事无成，那么我們必須把它設想成与过去的发展不同。因为这一点是毫無疑問地确定的：不管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它必然会带来

与迄今存在的事物不同的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就达到了对必然事物的理解中的一个新观点。人们只能以绝对的确定性认识将来的一个必然性：一切存在的事物或迟或早要毁灭。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已经形成的事物将要并且一定要消失。当然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库诺自己也把帝国主义称为一个阶段，就是说一个暂时的现象。它将要消逝，它将被“铲除”，它的灭亡是一个必然性，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灭亡。

这一问题事实上是库诺的小册子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全部论述的唯一基础。他的论战的核心是针对个别“帝国主义的消灭者”的这一假设的：资本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帝国主义已一筹莫展了。库诺认为这是一个大幻想，他对此表示反对。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就帝国主义是存在的、因此是必然的这一说法进行争论，并不能使我们朝着阐明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末日估计成多远或者多近这一问题前进一步。

对于后一问题我必须再说几句话，虽然我的批评已经达到不恰当的长度了。它比它所批评的对象更长了，但是如果我像库诺一样只限于用简短的暗示来解决他所提出的那些重要的、有争论的和复杂的问题，那么我就要犯这一次使库诺的著作大为逊色的那一同样的错误了，这时我也一定不会达到我的目的，即起阐明问题的作用。

六、资本主义的破产

(上略)每一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合起来能够造成极其多种多样的综合情况，这些情况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时期的各个阶级的力量，始终是变化不定和无法估计的。一个政党或者阶级在某一时期所能支配的实际力量，不能根据理论来确定，只

能根据事实来确定。当然，在这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会一再得到贯彻的，而在这一限度内理论也能使人洞察政治的前途。但是理论只能使人认识必然会使这一个或另一个政党或早或迟取得胜利的那些**趋势**，却不能确定胜利的**期限**。这种说法不仅对于那些指望明天就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而且对于那些指望在一百年后才取得胜利的政党来说，都是适合的。

对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实践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我们前进的确定的期限，而是我们对于发展**趋势**的见解。我们的策略是不是幻想，将取决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我们是否已经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趋势。我们党内的“聪明人”一向在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一点，而不是我们胜利的确定期限。可惜库诺没有研究这个主要问题。但愿这是因为他还在坚持我们过去的“幻想”。

特别是这两种趋势变得重要起来：**阶级对立尖锐化的趋势**和**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破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和它在经济上的破产是有点不同的。我怀疑无产阶级是否会容许经济破产有一天来到；在这以前资本主义的道义破产一定早就出现了。我把资本主义的道义破产理解成一个对当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政策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受它们剥削的、本来就对它们抱敌视态度的阶级即雇佣工人中发生，而且也在那些并没有直接从这一剥削获利、但是也没有直接受害的广大居民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中发生。这种介于无产者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的敌对态度比起雇佣工人的敌对态度来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但是它也削弱了维护现存事物的因素。

我从这两种趋势中看到了希望，一九〇九年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以如下的方式表述了这个希望：

“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难以预言即将到来的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因为一切需要考虑的因素，除了无产阶级之外，都是这样地不

确定和不可估計。

“能肯定的只是普遍的不安。能肯定的是，我們已經进入一个普遍不安、力量經常变动的时期。不管这个时期的形式和期限如何，在无产阶级有力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从而揭开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以前，它不再能以較长久的平静状态告終。

“这一革命时期是否会像从一七八九年开始一直延續到一八七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长，自然是不能逆料的。虽然今天的一切发展都比过去迅速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战場也无比地扩大了。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們所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場只是西欧。今天全世界都变成战場了。今天劳动人民和被剝削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战斗不仅在斯普雷河畔和賽納河畔进行，而且也在赫得逊河畔和密西西比河畔、在涅瓦河畔和达旦尼尔海峡、在恒河畔和黄河畔进行。

“也同战場一样巨大的、归根到底是从战場产生出来的任务是：世界經濟的社会組織。”

可以看出，我小心避免宣告确定的期限。到目前为止发展是按这里指出的方向繼續前进的。不过发展也促成了一些現象，它們使我預計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有可能首先还出現別的情况。

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衰退，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减軍备的意图，战前最后几年法德两国資本输出的迅速縮减，最后还有不同的金融資本集团日益发展的国际融合，促使我考虑到，現在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否被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取代，这一政策将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資本对世界的共同剝削来代替各国金融資本之間的相互斗争。資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無論如何是可以設想的。至于它是否也可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答这个问题。“加入发展中来的新成分”“还看不清楚”。但是我贊同庫諾的看法（第11頁），即发现和考察这些新成分，是理論

家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务。我也完全支持他的这一看法，即如果“把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开始时遇到的经济情况，看成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也可以說：必然的），那就完全錯了。他在这里引用了恩格斯的話，虽然恩格斯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用这句话（上面引号中的一句话是庫諾从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引来的。——譯者）的，但是我认为庫諾对这句话的运用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也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并且考虑了通过金融資本本身的另一种类型的政策把它克服的可能性。

如果到了这种超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至少資本主义道义上的破产趋势就有可能暂时緩和下来。

庫諾正确地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把不少現象看成資本主义破产的标志，而这些現象后来表明只不过是資本主义某一阶段的道义上破产的标志。例如受地产和貨幣資本束縛的工业資本的时期在将近一八四八年时就走向末日了，曼彻斯特主义的时期在八十年代也是一样。因此我們这一次可能还不是走向資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而只是走向帝国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

目前战争的进程和結局将能对此起决定性作用。战争可能使金融資本家間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軍备竞赛繼續进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表述的預断将实现到惊人的程度，阶级对立的尖銳化以及資本主义在道义上的破产都将迅速地发展。如果說，只要資本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就是真正必然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有把握地預計，我們將大踏步登上那一“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在历史上必要的”阶段。庫諾从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推論出資本主义会維持很久，其实他所說的話的反面才是正确的。

但是战争也可能有别的結局。它的結束方式可能使超帝国主

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可能加速和平时期要令人等待很久的那一发展。

如果能达到各民族间的协议、裁军和持久和平，那么战前曾经使资本主义愈来愈趋向道义上的破产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能够消失。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自然不久就会带来也许比已经克服的灾难还要坏的新灾难，不仅在资本主义的任何阶段必然要感到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要受这些灾难的害，而且比较中立的阶级和阶层也要受害。但是像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曼彻斯特主义以及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直到物价开始高涨时为止的帝国主义一样，超帝国主义暂时也可能带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

我承认，仅就这一点来说，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哪怕只是道义上的破产，是为时过早的。但是我认为，宣称这种破产长久之后都不可能出现，同样也是过分性急的。

这种破产可能比你们所认为的来得更早。

战争的结局会作出定论。战争中所争的不仅是个别国家的胜负。战胜国也会受到衰落的威胁，如果帝国主义政策在战后继续进行的话。战败国也会如释重负，如果帝国主义一蹶不振的话。

资产阶级政治家所能看到的也许只到胜利和失败为止。我们的任务是看得更远，要看到战争以后。我承认这不是轻松的任务。我们需要拿出全部理论力量才担负得起这一任务。在这一方面我对于库诺的期望比对任何人都大。我现在仍旧对他抱着期望。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三十日发表。
载于《新时代》第三十三卷（1914—1915年），第二册，第四期，第107—116页；第五期，第143—146页。

再論我們的幻想(摘錄)

一、帝國主義

(上略)我曾經這樣描寫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征服和吞併愈來愈多的農業區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麼民族。”

庫諾反駁說，在外國地區修築鐵路或者建設礦山，設立軍港和開鑿運河的意圖，也屬於帝國主義。當然如此。但是在什麼樣的“外國地區”？正是在農業地區。我並不認為，資本流入外國地區只是為了經營農業，也就是只是為了農業上的目的，而是認為，資本流向還不具有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不如說是處於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階段的那些國家。

因此我不能承認說我的定義過於狹隘的反對意見。

另一方面，在庫諾看來，我的定義又太廣泛了。它適用於任何殖民政策，不僅適用於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考茨基的定義不僅適用於現代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而且幾乎適用於隨便哪一種殖民政策，既適用於荷蘭在印度群島的殖民政策，又適用於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的殖民政策。考茨基的這個定義的特征性錯誤正是在於，它本來應當說明帝國主義的本質，却恰恰沒有考慮到近來的殖民政策的現代帝國主義特點。”

如果我的定義僅僅說到吞併或征服農業地區的意圖，那麼這個意見是正確的。這種意圖是任何一種殖民政策的本質。但是我認為帝國主義的特點在於，這一意圖是從“高度發達的工業資本主

义”产生的。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不是这样，西班牙或法国的殖民政策也不是这样，甚至荷兰的殖民政策也不是这样。前三个国家的殖民政策的动力不如說是封建貴族，他們为自己的后代寻找新的地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这种地区在大洋的对面是最容易找到的。此外商业資本也参加了，它在荷兰，尤其在英国同货币商业資本一起成了殖民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在英国直到十九世紀，封建貴族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凡是有殖民政策的地方，工业資本自然企图利用它，但是整个說来对它并无好感，因为它給工业資本带来的耗費和損失大于所得。工业資本愈强大，資本主义国家里对于殖民地的兴趣就愈减弱。

只是在工业資本的最新阶段，即大約三十年以来，它才对殖民地发生兴趣，而随着工业資本的力量和重要性的增长，殖民的擴張政策愈来愈成为国家政策的中心。殖民政策因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特殊的性质，使人有必要把它同过去的殖民政策区别开来。因此我們能够把它称为帝国主义的政策。

庫諾反对这种看法。他宣称，今天的殖民政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不是工业資本主义，而是金融資本。他把这个詞当作同“銀行資本”和“銀行金融”一样的意义来使用。

我也屡次按照这一意义使用过这个詞。但是希法亭却把它理解成一种特殊的現象。他說：

“我把銀行資本，也就是**实际上轉化为工业資本的货币形态的資本**，称为**金融資本**。对于所有主來說，它始終保持货币形态，被他們以货币資本、生利資本的形式投放，可以由他們不断地以货币形态抽回。但是这样地投放在銀行中的資本的絕大部分实际上轉化成工业的、生产的資本（生产資料和劳动力）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固定下来。在用于工业的資本中，有愈来愈大的一部分是金融資本

本，即归銀行支配和由工业家运用的資本。”（《金融資本》，第 283 頁）

如果接受这一看法（庫諾多半也会接受的），就可以說，在金融資本中，工业資本同銀行資本結合成了一个更高的統一体。

庫諾說銀行資本是“今天的殖民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这固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反对我而断定說，站在背后的因此不是“工业資本主义”，这就不对了，因为工业資本同銀行資本的日益发展的同一化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从这种同一化中产生出工业資本对殖民政策的愈来愈大的兴趣。但是由此也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內部冲突，帝国主义虽然受到工业資本的促进，但是結果却成了工业的障碍。

我的帝国主义定义包括了所有这些因素，因此我坚持这一定义。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

載于《新时代》第三十三卷（1914—1915年）
第二册，第八期，第 231—232 頁。

帝国主义战争(摘录)

二、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虽然严格说来“反动的一帮”并不属于本文的论题，我还是比较详细地作了论述。因为有这样的看法，即在帝国主义时代，一切政府根本上是彼此等值的，它们全体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无非是帝国主义的目的，它们的冲突无非是为了赃物的斗争，它们的斗争的结果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无所谓的，凡是在它们发生冲突的地方，必须从一开始就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它们全体。这一看法无非是把反动的一帮这个词从对内政策转用到对外政策上。

如果不了解帝国主义，一定不能了解当前的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政策的最近的和最强大的动力，但不是它的唯一动力。即使帝国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然地产生的，但它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在帝国主义中得到贯彻的是一种意图，追求超额利润的意图，这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特征。超额利润当然是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它只能随同资本主义一起消失，只能被社会主义消灭。但是帝国主义只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堵塞了资本的这条道路，它会为自己寻找别的道路。

资本从来不满足于平均利润，每一个资本家都不断追求特殊的超额利润。

人们或者通过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时的特别有利的地位，或者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特别有利的地位来取得超额利润。

商人只能依靠市场上的特惠才能取得超额利润。在商人资本

是最重要的資本形态并且能对国家統治者发生影响的时代，个别的大商人和商人团体企图通过他們的国家的权力取得在国内市場上以及也在世界市場的个别地方的壟断地位。各国的进行竞争的商人的对立成了国家本身的对立，往往导致战争。

这一情况已經由于商业的发展而改变了，商业感到这种壟断是限制。所謂“重商主义”这一壟断傾向还由于工业資本主义的繁荣而进一步得到克服。工业資本主义不需要这些获得超額利潤的方法，它把它們斥为昂貴的和危險的方法。它在对外政策方面变得爱好和平了。但是同时却对自己的工人殘酷无情。

对于工业資本主义來說，生产过程中特別有利的条件比市場上特別有利的条件重要得多。

工业資本家获得这种条件的最簡單的办法是，他对工人的剝削超过平均的通常的剝削。这是通过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或者雇用異常廉价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来达到的。

这种类型的追求超額利潤的意图支配着工业資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在厂主們为达到廉价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比赛中，这一个企图通过延长工时、实行夜工等等来击败另一个；这种比赛起初来势很猛，大有在短期內毁灭整个工人階級的危險。它激起了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喚起了不是直接参加資本主义工业的資产者階层的抗議，这些階层看得远一些，它們部分地为了保全受到濫用的威胁的本国生产力，部分地出于对无产階級革命的恐惧，采用了工人保护立法，从而挽救了国家和工业資本主义本身，使它們不致过早地毁灭自己的劳动力。这也是这样的一个事例，它揭露了反动的一帮这个詞是荒謬的，同样揭露，认为任何受經濟制約的資本主义意图似乎在經濟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能通过优势力量加以阻止的那一意見，也是荒謬的。

爭取标准劳动日、爭取限制資本家对超額利潤的渴望的斗争，

是一个单纯的**实力问题**。这一斗争是由无产阶级的压力加上资产阶级本身的眼光远大分子的卓见决定的。当然反抗工业资本的力量并不是浮在空中的，它不仅以忧伤的感情为基础，而且也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在《资本论》中针对那些对议会制度和法律上的劳动保护唯恐蔑视得不够的人说明了争取标准劳动日斗争的全部意义。但是，同是这部《资本论》也清楚地指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范围内任何工业劳动保护所受到的限制，指出了尽管进行种种改良，阶级斗争仍旧必然日益加剧，这种斗争的出路是剥夺剥夺者。

马克思就这样在《资本论》中表现为一个地道的“中派分子”。

法律上的劳动保护大大限制了在依靠增加对工人的折磨而取得超额利润方面的比赛，但是并没有完全抑制这一意图。它总能找到一试身手的办法和途径。例如现在就有泰勒制。

资本越是在一条道路上受到限制，它就会在自由竞争中挤到另一条在生产过程中依靠异常有效率或异常廉价的劳动力来捞取超额利润的道路上来；采用能在同样的耗费下提供超过平均通常数量的产品的那些机器和操作方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革命意义，它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就在这里，就在技术改革的领域里。

但是资本家关心的不是进步，而是利润。如果他能够通过退步来扩大利润，那他就宁可要退步。说对于资本家的利润要求的任何支持都有助于“进步”，这是再可笑不过的意见。

技术进步给个别资本家带来的超额利润，只有当这一进步保持为一种例外时才能归他所有。这种进步一旦被推广，不仅超额利润要消失，甚至一般的利润率也有下降的危险。

只要人们还停留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反

之，一旦壟斷代替了競爭，情況就要改變。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繼續前進的過程中，壟斷的時代來到了。這一時代不僅使資本愈來愈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企業主同盟、股份公司和銀行促使資本的**管理和支配**的集中化比資本的**所有權**的集中化進行得遠為迅速。這樣，在先進資本主義工業各國就出現了大壟斷的統治和大壟斷對於國家政權的支配。大壟斷發展了一種新的獲得超額利潤的方法，或者不如說使自由貿易時代以前用來為商人謀利的那些舊方法現代化了。大資本家又一次試圖靠國家政權的幫助在市場上取得壟斷的特惠地位；一方面通過**保護關稅**，保護關稅削弱了國內市場上的外來競爭，減輕企業主組織的負擔，並且使它們有力量在世界市場上進行傾銷競爭。另一方面通過**殖民政策**，即把農業地區歸併於工業國家，作為它們的直接殖民地或者附屬國，並且把這些地區作為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輸出資本的投放場所而加以壟斷。

人們稱這一政策為帝國主義的政策。它是一種現代化了的、最大規模的重商主義。它對於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工業生產的繼續進行來說，不是一種必然性，而只是獲得超額利潤的方法之一。反對和限制這種方法，就像標準工作日一樣，對於工業並無妨礙。在實行標準工作日時，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會曾經宣稱，它會毀滅工業和損害工人本身。區別僅僅在於，那時工人認識到這種遁詞是空洞的，而現在有名望的工會活動家却在有名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指導下“證明”，資本主義巨頭獲得超額利潤的帝國主義方法對於工人來說是一種必然性。

三、各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多樣性

帝國主義問題同過去的“勞動自由”問題一樣，實際上是一個單純的實力問題。帝國主義政策是否能夠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國家中得到貫徹，這是那些同帝國主義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階級、

尤其是那些受到帝国主义危害的阶级的**实力问题**，但是最终也是那些阶级的**经济见识**的问题。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中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帝国主义政策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同样有力，它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以同样方式出现的。

例如，德国和英国两者都处于同样的资本主义水平，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多大！英国有历史上传下来的议会制度，德国则是驾于议会之上的君主制。英国直到战争以前有一小支以自愿应募制为基础的军队，德国则有世界上最强的、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英国没有小农，手工业不多，工业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自由和强大。资本家阶级中的船舶业以及商人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对比，都比德国强大。

在德国的就业者中，工业有一千一百三十万人，农业有九百九十万人；在英国的就业者中，工业有七百五十万人，农业有一百四十万人。

另一方面，在德国，同一千一百三十万工业就业者相比，有三百五十万商业和交通中的就业者和三百万吨位的商船队。在英国，同工业中的七百五十万人相比，却是商业中的四百万人和一千二百万吨位的商船队。

在工业资本本身的范围内，在德国占优势的是重工业，在英国是纺织工业。德国一九一四年有一千一百四十万棉纺锭，英国有一千六百万。反之，德国一九一二年的生铁产量是一千七百六十万吨，英国是九百万吨。最后，银行对工业的统治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发达得多。

这一切促使帝国主义在英国采取了同德国完全不同的形式，它的不少重大特征在英国根本没有得到发展，或者只有微弱的发展。

例如英国始终是自由贸易的国家，虽然保护关税属于帝国主

义的本质。它容許它的許多殖民地有充分的自治，甚至有自己的关税政策，这种关税政策甚至成为针对宗主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政策則完全相反。

美国帝国主义像英国帝国主义一样，也表现出符合本国的特点和历史的十分独特的特征。一八九八年从西班牙夺来的菲律宾，在一九〇七年已經获得自治，不仅是村社的自治，而且有一个选举出来的立法会議。已經完全自願地答应給它們以完全的独立。——这是殖民史上从未听到过的行动。而这个諾言可能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海外殖民政策对于美国資本的擴張意图來說可能容易使它脫离那条有希望給它带来最大成就的道路，即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和平渗透”的道路。只不过对于菲律宾可能成为日本擴張意图的牺牲品的担心，成了不让它們自己管自己的强大动因。

美国迄今缺乏一支强大的軍队，这同对于放棄一处殖民地的思想的玩弄一样，也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征。富足的美国連同它的一亿居民并不具有貧穷的墨西哥連同它的一千五百万居民所控制的那樣一支軍队。

强大的軍队同保护关税和殖民政策一样，也属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因为帝国主义同自由貿易相反，造成了民族对立。帝国主义获得超額利潤，当然一部分是靠牺牲本国部分居民——劳动階級和沒有参加壟断的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一部分是靠牺牲被占領的殖民地区的劳动階級的利益，但是也有一部分是靠牺牲其他国家的資本家的利益。特别是最后一种意图造成了各国之間的日益增长的对立，对立表现为激烈的陆上和海上的軍备竞赛。

帝国主义就这样取得日益增长的实力手段或者扩大現有的实力手段。这些实力手段根据各国的政治情况、历史和傳統的不同而获得了或多或少的独立生命，于是就有可能引起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固然首先要归之于帝国主义，但决不是一定意味着帝国主

义利益的促进,而是可能損害大壟断資本家的超額利潤。

目前的战争的反作用也在美国喚起了追求强大的軍事装备的意图。这些軍事装备应当只用于防御,它們是这一恐惧的产物:最后的胜利者可能在大規模战斗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它产生了統治世界、也蹂躪美国的欲望。但是尽管新的战争实力只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造成的,它只要一旦存在,就容易在統治階級中喚起利用它来进行征服的意图。

总而言之,尽管帝国主义使一切大国发展了軍国主义傾向,但是軍国主义所遇到的历史先决条件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它的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中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点也說明不能把这些国家全部当作“帝国主义的”而混为一談。

四、帝国主义以前的擴張意图和民族对立

在帝国主义的这些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包括这一点:帝国主义使旧的問題和意图复活了,这些問題和意图是在帝国主义以前久已存在的,但是如果沒有帝国主义,它們在現存制度中几乎不会起什么作用。由于帝国主义,它們恢复了生命和运动。

追求国家擴張的欲望不仅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十八世紀的王朝专制主义有过同样的欲望。它把国家看成自己的領地。各族人民絲毫不能过問国家行政,他們的民族籍不起任何作用。扩大和补充自己的国家,是每一个封建主的意图,这一意图只有在遇到其他封建主的优势力量时才受到限制。每一次实力变动都会誘起一次边界变动,但是因此也会产生軍事冲突的可能性。在現代工业資本主义及其高度发达的交通事业的兴起創造了企图使国家从封建主的領地轉变为民族領土的現代民主制和現代民族运动以前,这种軍事冲突是无尽无休的。民主制和民族运动认为,每一

个民族应当自由地支配自己的領土。这一来，每一个国家就有了确定的边界，越出这一边界的任何意图都被排除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正确手段不应当是战争，而应当是革命。为了解放波兰而进行的反对俄国的战争是例外，俄国那时看来是不可能发生革命的。

这一民族运动不是以各民族的相互憎恨为基础，力争向上的各民族的民主派紧密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封建主。封建主的国际同盟与民主派的国际联系相对立。在这种局面下，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欧洲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不再进行革命，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资产阶级坚持自己的民族理想。但是应当贯彻这一理想的不再是革命，而是个别王朝，人们信任这些王朝的军事力量，它们足够地大胆，能够通过自己的王朝特殊意图来打破神圣同盟时代以来的封建主国际团结，它们在民族目的的后面隐藏着这些意图，并且通过民族目的加强了这些意图。

在克里木战争已经使神圣同盟破裂以后，接着是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〇年的王朝民族战争时期。的确也还可以把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算入这类战争。

专制主义时代的王朝征服意图在这些战争中重新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已经足够地强大，能在这一意图上打下自己的烙印了。这些战争受民族思想支配，征服意图受到了民族思想的限制。

于是在上一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帝国主义宣布吞并原始的农业地区，在这些地区里现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唤醒任何民族政治生活，因此这些地区可以被并入这个国家而对它毫无损害，正像十八世纪时专制主义在不能通过继承或婚姻而得到一个国家时可以将它征服而不必考虑它属于什么民族一样。现代民主的民族思想在十九世纪给欧洲各国的征服欲所规定的扩张渴望的限度，对于帝国主义的对象来说失去了效力。民族主义本身获得

了新的內容。它从爭取民族独立的意图变成了爭取民族統治的意图。这一意图过去仅仅在多民族国家中才会发现，現在也移植到民族国家身上了。

但是这一来也給十八世紀、甚至十七世紀即俄国的彼得的时代就已經存在的那些意图重新开辟了道路。同时由于各国之間的帝国主义对立，也重新提出了資产階級进行民族奋斗的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悬而未决的問題，或者使这些問題不至被忘記。例如亚尔薩斯問題，意大利的領土收复运动，波兰問題。如果說它們現在作为实际問題吸引了我們，那么这肯定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給了它們以新的力量。但是不能称它們为帝国主义的問題，它們可能造成对于帝国主义者完全无所謂的、甚至同他們的意图直接抵触的对立和冲突。

五、对于帝国主义意图的軍事抵抗

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在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对抗的意图。这类意图虽然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它們的目的不是促进帝国主义，而是抵抗帝国主义。如果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时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战争，难道人們就能直截了当地說它会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嗎？当然也不能一上来就作出相反的断語。因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力图抵抗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意图时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工具体。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十八世紀在北美洲进行那些殖民战争时，爭夺的对象是他們从印第安人夺取的土地。但是双方都懂得爭取印第安人做同盟者，印第安人因此从征服的牺牲品变成了征服的工具。在今天的战争中在更大的規模上发生着同样的情况，不仅是野蛮的种族，而且有一些相当发达的国家，它們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却作为工具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效劳。但是这倒不

是說，它們自己的利益是帝国主义性的，因而这些国家是否被人踐踏对人类的社会发展來說是無所謂的。

六、資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差别

不过就国家來說，不仅要区分出高度发达的和落后的，区分出帝国主义的代表者和它的間或也成为工具的牺牲品。必須也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間作出区分。

上面已經說明，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經濟必要性，就是說生产并不是如果没有它就不再能在資本主义的範圍內有效地进行，不如說帝国主义政策只是从某些資本家阶层的利潤意图产生的，資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阶层愈来愈强大；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問題就是它的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問題，它取决于国内的能从帝国主义获利的阶层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强大到什么程度。仅仅由于拥护帝国主义的阶层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之間的力量对比上的种种差别，就已經有可能产生国家之間的极大差别，虽然它們按照經濟水平对于帝国主义來說都是同样成熟的。

不过帝国主义就其整个本质來說，不仅是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問題，而且也是对外政策方面的实力問題。帝国主义的政策正是实力政策，別无其它。但是实力政策只能由强者来执行。在一个国家內，尽管金融資本已經十分强大，但是它也不能找到遵循它所要求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如果它的国家缺乏为此所必需的力量的一句話。

因此帝国主义政策根本不是所有的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政策(如果这种政策对資本主义及其工业說來是一种“必然性”，那它就一定会是所有的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政策)，而只是**資本主义大国**的政策。国家愈大，它的軍事实力手段愈强，它的帝国主义意

图(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力量对比相同的情况下)就会发展和贯彻得更为强烈。国家愈小,它的实力手段愈薄弱,人们在那里发现的帝国主义就愈少。

七、帝国主义的变化

帝国主义像资本主义和利润意图一样,就本质来说是无限的。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最喜欢靠牺牲一切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来提高自己的超额利润,喜欢垄断整个世界。追求世界霸权的意图是以帝国主义的本质为基础的。但正是这一意图最容易遇到激烈的抵抗。有时它也许能在一个特别强大的、惯于取得胜利的社会中点起一阵自大狂的烟雾,但是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是可怜的忧郁。

尽管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要求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反对一切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战争,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联盟,尽管开始时有些摩擦。

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踏上了通向大大地修改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以此证明,他们的意图并不排除各国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的协议,在有一个优势力量同他们对立的地方,他们是很懂得达成这种协议的。现在的战争决不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即两个阵营的为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就对世界的分割和剥削达成协议。的确,我们甚至必须预计到这样的可能性:世界会亲眼看到一场叫我们害羞的戏,即帝国主义者的国际比社会党的国际更早地生效。

当然帝国主义者的协议不是我们所努力争取的东西。我们需要各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党国际领导下达成的协议。帝国主义国际也许能带来世界和平,有时甚至能保障和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国际辛迪加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剥削将变得更加有

計劃和更加大規模。

不过无产階級的抵抗运动一定会来得更为强大，无产階級的国际階級斗争那时就不再会由于任何民族分歧而被模糊和打乱了。

不言而喻，这样說并不是在作出預言。今天是絕對不可能說战争会怎样結束的。帝国主义者的国际協議不过是战争結束的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人們只有把握說这句话：即使国家边界的現狀保持不变，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現狀是一去不复返了。在締結和約的时候，我們將不是簡單地从我們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我們将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这种說法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如果帝国主义能熬过这场战争，就是說如果欧洲在战争以后还能保持要求世界統治地位的力量，那么帝国主义在摆脱战争时将是面目全非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发表。

載于《新时代》第三十五卷(1916—1917年)
第一册，第二十期，第475—483頁。

帝国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第五編第八章

人們也許會說，这种不断的擴張意图只是过去的国家的特征。說今天在欧洲沒有出現擴張的欲望，这是对的。至少在西方是如此。西方的国家并不力求在欧洲取得新領土，葡萄牙和西班牙不想，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那維亚国家也不想。法国在上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收回了它被德国在一八七一年夺去的地方。英国在最近一百年里不仅沒有在欧洲占有任何新領土，甚至还自願地放棄了一些領土。这些領土虽小，然而却是海上的实力基地。它在一八六三年把一八一〇年占領的爱奥尼亚群島让給了希腊。英国人在一八〇七年占領了黑尔郭兰島，他們在一八九〇年自願与德国达成協議，根据这一協議把这个島交給德国（換取了在桑給巴尔的让步）。

的确，德国和意大利在最近一百年中有时也曾經扩大它們在欧洲的領土，但是这只是根据为擴張規定了一定限度的民族原則来进行的。無論是在亚尔薩斯-洛林的場合，还是在意大利同今天的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問題上，这一原則固然由于战略上和經濟上的考虑而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但是毕竟还没有被廢棄。

但是擴張欲望的所有这些限制仅仅适用于欧洲內部，而且只适用于它的經濟比較发达的部分。我們还会看到这一情况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但是这些在欧洲限制了自己的强国表現了在这一大洲以外即使在現在也还无限制地擴張的傾向。

我們只要看一下大不列顛。最近一百年內它在歐洲沒有表現任何擴張欲望，就是在早些時候，自從工業資本興起以來，它在那裏也只表現很小的對於新領土的欲望。在十八世紀它在歐洲只占領了直布羅陀（一七〇四年）和馬爾他（一八〇〇年）以及地中海上西班牙屬梅諾爾卡群島的要塞港口馬翁。不過英國人在一八七二年又放棄了他們一七〇八年奪得的後一領土。

但是在歐洲以外，英國人建成了一個迄今在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帝國。它包括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陸地，同樣也包括地球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並且這個龐大帝國的絕大部分是在從七年戰爭開始（一七五六年）到偉大的拿破侖戰爭結束（一八一四年）的兩個世代中，像當年的波斯帝國一樣迅速地被囊括進來的。在這期間加拿大被征服了，東印度的一大部分以及南非和澳洲被占領了。

殖民主義的方法到今天為止也是建立最初國家的方法。在剝削殖民地（有別於移民殖民地）中，統治的剝削階級總是由入侵的外族組成的，它站在提供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土著居民之上，把他們當作低等的種族，沒有任何共同利益把它同這一種族聯繫起來。

使殖民帝國擴張和日益牢固地團結的意圖最近一個世代在英國得到了一個特有的名稱。人們稱它為帝國主義。後來人們把這一名稱推廣了，今天人們喜歡用它來表示一個國家的任何擴張意圖。

有些人甚至在瑞士發現了帝國主義，說是因為瑞士的資本家樂於把自己的資本投放成外國證券，這顯然是從征服外國的意圖出發的。

過去屢次發生這樣的情況，這次也是如此。只要人們找到了一個外來詞而且居然是一個拉丁詞來表示一種現象，那麼這就已經可以算是对現象的科學解釋了。有些人相信，當他們宣稱征服

政策产生于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們就是說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真理。这种情况再一次使人想起由 Powerteh^① 造成的貧困。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一詞只是几十年以来才出名，它就給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这个詞所表示的傾向也并不更早些。当一种經濟理論把帝国主义同資本主义的最新表現形式即金融資本联系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就更像这样了。

上面这种看法不是愚蠢，而是很有意义的。

貨幣資本和商业資本像土地貴族一样，大多充滿了国内剝削階級所固有的那种擴張剝削地区的欲望。有多少經濟战争不是由商业嫉視造成的呢！相反，工业資本在一开始的时候最主張和平，并且厌恶任何征服战争。随着英国的工业資本的加强，它的政策变得更加和平了。自由貿易与和平成为工业資本的首領——科布頓和布莱特的口号，而自从上一世紀六十年代以来英国工人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这一口号引向自由党的。即使英国工人已不再追随这个党，他們今天仍旧坚持这个口号。

馬克思一直反对这个党。因为它在自由貿易和劳动自由的名义下反对国家的劳动保护法，并且在和平的名义下发展了它对欧洲民主的死敌——沙皇俄国的强烈的同情。俄国的专制君主們迄今一直懂得爭取英国工业階級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这个只有微弱工业的巨大农业国是英国出口貨物的最有希望的銷售市場。人們在英国謀求同专制制度保持和平，并且安慰自己說，专制制度是俄国的内部事务，与西方民主国家毫无关系。

英国就是在这种和平情緒中于一八六三年放棄了爱奥尼亚群島。我們可以說，一八九〇年将黑尔郭兰島让給德国，是这种情緒的最后余音。

① 古代法語“貧困”一詞(“poverté”)的德文譯音。——譯者注

但是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精神已经开始掌握工业资本。愈来愈只有工人还忠实于和平纲领了。

股份制和企业主同盟的发展使工业愈来愈紧密地同货币资本、同银行结合起来，并且就这样产生了鲁·希法亭第一个对之进行了系统和彻底的研究的那种新现象，他把它叫作金融资本。在这一形式下工业资本发展了同样的对被剥削者和竞争者使用暴力的思想，这一思想迄今一直是所有剥削阶级的特征。

因此仅就这一点来说，当然要把帝国主义归咎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因而形成了标志着最近几十年的特征的新现象。但是，不能对此作这样的理解，即一些国家的扩张意图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扩张意图同国家本身的存在一样长久，并且一直是任何国家的特征。工业资本给这种现象带来的新的一面仅仅在于，它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反对这种进行新的征服的意图，它削弱了这种意图，但是自从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来，它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没有反对过扩张的欲望，而且还为它提供了新的力量。

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期望一步进一步地抑制这种征服欲望的话，那末，我们是指靠在资本主义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中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日益强大，以及殖民地本身的民族起义和独立运动的逐步增强。但是，也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从世界大战得到教训的金融资本认为这一种扩张剥削地区的方法过分冒险，认为人们在这种追求增加利润的努力中会把全部资本置于过于危险的境地，不如转入超帝国主义，把所有国家的金融资本家联合成一个国际卡特尔更为有利。

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章的内容，在那里我们要涉及国家的最新的趋势。这里只要说明下面一点就够了，即直到我们今天为止，一切国家都表现了不断的扩张要求。在条件不利、特别是力量薄弱的时候，这种要求的表现会受到阻碍，但是只要一出现可能满

足它的前景时，它就立刻起作用。这一要求，这一进行征服战争的欲望，同迄今的国家的本质有着必然的联系。它的深刻根源在于每一个剥削阶级的增加自己的剥削所得的欲望，而通过增加被剥削者的数目来达到这种增加是最容易的。

只要国家还是一个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就无可改变地固有着扩张国家领土的欲望，就像工业资本主义固有着扩大企业的欲望一样。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写于一九二七年），柏林一九二九年德文版第143—146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帝国主义_考茨基

作者 =

页数 = 57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帝国主义
附录

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摘录）

再论我们的幻想（摘录）

帝国主义战争（摘录）

帝国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第五编第八章